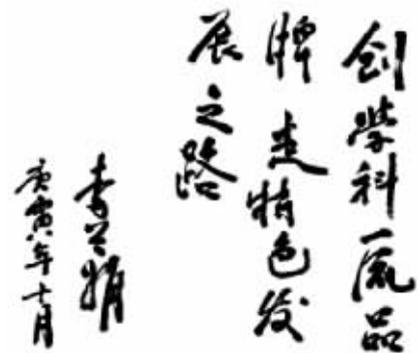


我身边的卓越杭高人

李兰娟:从“赤脚医生”到院士(1)



▲ 李兰娟题字

防治 H7N9 禽流感战役,让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被更多的人熟悉。作为我国传染病学领域杰出的领军人物,李兰娟从事传染病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已经 40 年,她是我国人工肝的开拓者,创建的人工肝支持系统治疗重型肝炎曾获得重大突破。她首次提出感染微生态学理论,从微生态角度来审视感染的发生、发展和结局,为感染防治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在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我们见到了匆匆从病区查房回来的李兰娟。等待时,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李院士工作繁忙,经常半夜还在实验室,一早就出现在病房了,每天睡眠不超过 6 小时。

干练短发,柳叶眉,面带微笑。这就是李兰娟校友留给人最典型的印象。

“能走到今天,我要感谢很多人。”说起自己的成长历程,李兰娟有太多的感慨,她说如果没有那么多热心人帮助,或许如今的她还是一名山村“赤脚医生”,而不会有今天的成绩。

靠助学金读完了中学

李兰娟出生在浙江绍兴夏履镇夏履桥村,家境贫寒,父亲因患眼疾无法劳作,全家生活

靠母亲卖山货维持。她自幼喜欢读书,但她的求学之路并不平坦。

1960 年李兰娟从绍兴夏履中心小学毕业后,被保送到绍兴第一初级中学。读初二时正逢国家困难时期,她因生活困难而面临辍学,离别校园时,李兰娟频频回首,班主任看出了她渴望读书的心情,果断地让她把行李留在学校,先请一个月的假,回家后慢慢再想办法。回家后,李兰娟一边劳动一边学习,每天坚持看书自学。

一个月后,终于获得重返校园的机会,而此时正值期末考试,李兰娟竟考得非常好。就这样,靠着助学金坚持读完了初中,并参加全省统一中考。考虑到家境困难,想能尽早参加工作,李兰娟第一、第二志愿就都填报了中专。

然而,因成绩优异却被省重点中学杭州第一中学(今杭州高级中学)录取了。绍兴一初班主任老师还专程从绍兴城赶到夏履桥山沟,动员她去读高中。于是她怀揣母亲给的 5 元钱,踏



通过“四抗三平衡”疗法,H7N9 患者得到康复。图为李兰娟看望病人

上了赴省城求学之路。来到杭一中高一(4)班,来不及熟悉书香弥漫的校园,仅有的 5 元钱就用完了,学费也没有着落。学校知情后全免了她的学费。

50 年前的一幕幕让她至今难以忘怀:“老师知道我的困难后立即给予解决,让我先领课本,后来不仅减免了学费,还发助学金让我维持日常生活,我就这样坚持读完了高中。”从初中、高中到大学,凭借着聪慧的天资和顽强拼搏的精神,不但学习成绩优异,而且还一直担任班长、团支部书记。

自学成才的“赤脚医生”

顺利高中毕业的李兰娟,还没来得及参加高考,“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响应号召的李兰娟积极报名去黑龙江,没被批准,便回到了老家夏履桥,乡里安排她到夏履中学做代课老师。业余时间,她用针灸为



李兰娟校友在作报告

乡亲治疗腰背疼痛。她说,山区乡亲们因常年劳累,多数人患有腰背疼痛毛病,听说针灸能治疗疼痛,为了能为乡亲们做点好事,在回乡前她便联系浙江省中医院学起了针灸。短短几个月时间,她将整本经络书背得滚瓜烂熟。“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医学,在这之前,我对医疗知识完全是个门外汉。”李兰娟说。

教了三个月书后,村里组建农村合作医疗,因为李兰娟会针灸疗法,大家都希望她来做合作医疗的“赤脚医生”。“当时真的很矛盾。代课老师每个月的工资是 24 元,相当于每天能有 8 毛钱,而‘赤脚医生’每天只有 5 个工分,相当于 1 毛钱。收入相差甚远,家里日子又捉襟见肘。但对医学的挚爱,让我无怨无悔地选择当‘赤脚医生’。”

山村的“赤脚医生”并不好当,资金有限,设备简陋。为了节省开支,李兰娟与几位懂草药的乡亲一起跑到山上采草药。半年多时间里,她认识了几十种药材,哪些能治疗伤寒,哪些能用来消肿,哪些能用来敷跌打,她都记得清清楚楚。零成本的草药不仅节省了合作医疗的开支,而且效果不错,很多村民在喝了李兰娟煎服的草药后康复了。全村 400 多户人家,只要哪家有人生病,不管刮风下雨,不管更深半夜,李兰娟都会上门诊治。有一次,村里年轻媳妇分娩,李兰娟也硬着头皮当起了临时“产科医生”。

(上接 122 期第三版)

我在一中二年级只读了上学期,却在寒假中由我父亲向学校函请自动退学。我父亲的信上说:“留为五四学潮之纪念。”因之,这一段经过,不可以不记。

早在五四运动之初,全国学生有借赌赎路的运动,便是要集少成多,将胶济铁路自日本人手中赎回。大家都知道,五四运动是巴黎和会中的山东问题而起,列强承认日本继续享有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因以引起全国的公愤。在民国八年暑假以前,我们在学校中就有救国十人团的组织,以每十人为一组,每人每日或每周须储蓄铜元数枚,交由推定的干事保管。其时大洋一元可换铜元三百枚,我是走读生,便参加同一个自修室的十人团。家中每天给我的零用钱,都捐作储款。及至暑假以后开学,全国的赎路运动已趋于冷淡,我们这一团所收的储款也只有几元大洋。就有人说,赎路谈不到了,不如自己办一个刊物吧!于是便决定创刊明星月刊,第一期于民国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版。这是全浙江省用白话文,用新式标点,介绍新学说的最早刊物。说来也许有人不相信,这最早刊物,竟是一批中学二年级学生自己创办,并且每一篇文章都是我们自己写的。最初的计划是将第一期售出了,得来的钱再办第二期。因为我父亲于民国初年,就在杭州创办有浙江印刷公司,这也是全浙江最早规模较大的铅印地方,所以印刷没有困难。那知第一期出版之后,除送各校的学生免费阅读外,竟没有销路。赎路储款用完了,十人团也解散了,团员们更没有力量再办第二期,明星月刊只得结束。

但是我并不灰心,我于九月二十九日,写了几封信给其它学校中的同学说:“……不如重新办一个吧!但须征求下列三种人:(一)能销;(二)能出钱,能作稿子,兼全就更好。”居然征得了几个同好,尤其一中一年级

的新生国文状元查猛济兄更为热心。他当时是我们心目中的白话文典范,所以就由他写新刊物的发刊词。时间择定双十节创刊,因以就定名为双十,并且认为明星原为月刊,不够味,乃改为半月刊。查猛济兄其时只是中学一年级的新生,而他在发刊词上竟写道:“……所以我们发刊这种半月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一方面竭力把新思潮传布,一方面对于守旧派,立于指导的地位,下一种诚恳的劝告。”

我们当时的自命不凡,可以想见。双十出版之后,因内容丰富,立即轰动于杭州的各中等以上学校。许多学校的学生纷纷来购买,还有许多学校的教师写信来鼓励。我现在摘抄杭州第一师范国文教师的来信如下:

“我很佩服你们的精神魄力。双十在杭州,不能不看做是第一颗的明星,希望你们格外努力。做事创始为强,继起较多。各校学生中,如有能热心文化运动的,不妨互相联络,都作为编辑员。最好设法改为周刊。”

我们得到了这样大的鼓励,自然格外振奋,不久就有各校学生表示愿意参加,其中最多的是省立工业专门学校与省立第一师范高年级的。他们的程度比我们高,办事能力也比我们强。于是在我家中的大厅,开了一次谈话会,共到二十八人,决定改为周刊,双十只出版了两期,就再改为浙江新潮。仍由查猛济兄写发刊词,说明精神仍与以前的双十一样,并且是各校学生以个名义集合,与各学校各学生会无关。在明星与双十出版的时候,原由我任通讯员,迨浙江新潮出版,经改由第一师范的黄宗范担任。所谓通讯员,便是现在的社长兼发行人。我那时只十五岁,黄君比我大,但也不会超过二十岁。好在那时候没有出版品登记制度,可以由我们自由创刊。

浙江新潮出版之后,因为执笔的人水平较高,真可以说是洛阳纸贵,不但学生界人手一纸,社会上也争相传阅。第一期印一千份,两天就卖完,立即再版。第二期随之出版,买的人更多。远至北京、长沙、贵阳、重庆、广州,都有人写信来买,把我们二十八个人忙得不亦乐乎。而各地写信来讨论问题的也很多,这些人在后来有许多成为政治方面与教育文化界的领导人物。这些信件我一直

保存到抗战开始,终因杭州的沦陷而散佚了。明星、双十与浙江新潮,这三种我在五四时代参加创办的刊物,也一张不存。

浙江新潮第二期出版后,杭州便发生澎湃的政潮。因为通讯员黄君是第一师范的学生,就有些省议员藉此发动要排斥一师校长经亨颐先生。经先生当年还兼任省教育会会长,位于杭州平海路的省教育会大厦,便是经先生一手筹建的。省议员在议会中提出质问,说:“浙江新潮用白话文,提倡新文化,有如洪水猛兽,流毒无穷。”又说:“贻害青年,莫此为甚。”提出质问的先后有二批,每批都有数十位议员署名,其中有一件是要省长公署查办经校长,说经校长“盘踞该校,恬恶不悛。”

“为四百兆人民福利计,谨依法律提出查办。”于是省长公署派教育厅科员富光年到第一师范调查,一面令知杭州省会警察厅查禁浙江新潮,并不准任何印刷店印刷。浙江印刷公司

虽系我父亲创办,此时也无法再印。于是我们乃派人到上海去印刷第三期,仍携杭发行。我现在还记得第三期在上海印好带到杭州,我到车站去接运的情形,不出几个小时,便被抢购一空。我们对省议会的质问或查办案未表示任何态度,因为我们早说过这是各校学生的刊物,与任何学校无关,与经校长更无关系。

然而议会中的空气愈来愈紧张,各方面风声也愈来愈紧,我们二十八人之中就有几位登报声明脱离浙江新潮,这全是省立工专的学生。同时,新潮的销路虽好,却并没有多钱,要继续到上海去印第四期也已无力量,只得停刊。挨到了寒假,省立一师的经校长被免职,一中的吴校长也因为我们而被迫辞职。凡有学生参加浙江新潮的学校,都开除了若干学生,并且连累了若干并未参加浙江新潮只是参加校外学生联合会或是校内学生自治会的同学,也遭到处分。

省立一中,我那时就读的学校,在新校长郭成九先生(原为我们二年级的几何教师)到职之后,就召开了校务会议,议决开除学生十人。我在学校中的两位大哥王乃宽查猛济都在其内。他们都是应我之邀参加浙江新潮的,乃竟后来入上海浦东中学,再入南开大学,又到美国习航空,颇有成就。猛济从

此就在家自修未再入学校。抗战时期任英士大学国文教授,为自学成功的一人。

至于我呢,却因为我父亲是当时的私立法政专门学校的校长与杭州律师公会会长,在社会上着有声誉。据说在校务会议席上曾讨论很久,结果决定只予以训告,我父亲听到了以后,大不以为然。立即写了一封信给校长,原信如左:

“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鉴:五四以来,各处学生过于活动,诚不免流于一偏。然此乃我国近数年来板教育之反动力,苟思补救方法,必须集合全国教育专家,详细筹划。断非一二官吏之武断,所能解决。前闻贵校有斥退学生之议,比以小儿毅成亦在嫌疑之列,未便置议。兹悉贵校教职员会议议决,将于学生联合会及学生自治会有关系者,斥退十人,小儿仅予训告。教职员诸先生,对于法提出查办。”于是省长公署派教育厅科员富光年到第一师范调查,一面令知杭州省会警察厅查禁浙江新潮,并不准任何印刷店印刷。浙江印刷公司

阮性存谨启
民国九年二月十八日”

我父亲素有气喘病,到了冬季便很少出门。其时方只四十七岁,比我现在还小十一岁。自称老悖之见,实系当时最富有新思想的人。他的这一封信震动了杭州的教育界,一中的新任校长与教职员,都感到没趣。也使得许多亲友为赞叹,因而,我也连带地更为注意。现在事隔四十二年,我还能记得父亲当时扶病急书的情景,他并且严正地对我说:“这就是教育。”

我离开了一中,杭州其它的中学自不会欢迎我去。到上海去住校年龄又太小,父亲不放心。他乃与新任的一师校长姜琦先生商量,可否准我到一师去求学。因为一师全部是公费,不收插班生,只能许我到校旁听,没有学籍。这已经是破例的办法。父亲明知我无意学师范,也只得暂时先去旁听再说。一师设于昔年的贡院,离我家很远,每天要步行来回。尤其困难的是不能搭午饭,父亲便将他清末在日本留学用过的便当,画成图样,请铜匠店照做一个。因为货真价实,那便当颇有点重量,我便每天自己带午饭去吃。便当上学,现在台湾极为普通,但在民国九年春季的杭州,我是最早的并且是唯一的。我在一师旁听了一年半,到了十七岁便转学到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

总之,五四时代的国家是动乱的,而在教育界与文化界则是光辉的。我在这光辉的时代中,曾经过了一番动乱。但无论是光辉或是动乱,都对于我的一生具有深刻的影响力量。

阮毅成:五四时代的我 2

▶ 和阮毅成一起办浙江新潮的施存统

